

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

陈弱水 著

郭英剑 徐承向 译



剑桥中华文史丛书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

陈弱水 著
郭英剑 徐承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陈弱水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0. 1

(剑桥中华文史丛书)

ISBN 978-7-5343-9180-4

I. 柳… II. 陈… III. 柳宗元 (773~819)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5459 号

Jo-shui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ISBN 0 - 521 - 41964 - 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简体字版权©2010 江苏教育出版社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作 者 陈弱水

译 者 郭英剑 徐承向

策 划 章俊弟 余晓灵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吉祖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星光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电 话 025-57572528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9180-4

定 价 18.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657708, 83658558, 83658511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551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致 谢

在写作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个人和机构的帮助,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余英时教授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许多年以来,我一直跟随余教授学习,学习他的著作,参加他的研讨会,聆听他的课程讲授,包括和他有一些私人的对话。无论是他在学术上给予我的启发还是对我个人的帮助,都令我受益匪浅。我也要衷心感谢我在耶鲁大学的另外两位老师,皮特莱斯·巴莱特(中文名:白彬菊)教授和乔纳森·斯宾斯(中文名:史景迁)教授,感谢他们对我的论文所给予的帮助、指导和极富教益的意见。尤其我还要感谢丹尼斯·特维切特(中文名:杜希德)教授和霍伊特·蒂尔曼(中文名:田浩)教授。他们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特维切特教授一直都在鼓励我。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也以不同方式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劳伦斯·卡宁汉姆、迈克尔·杜克、菲利普·霍尔登、罗伯特·卡拉默尔、邝龔子、卡琳·普莱森丹兹、埃德温·普利布莱克、凯瑟琳·斯沃泰克、朱纳·威利-科恩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给了我很多建议,使我免于各种错误。彼得·波尔、丘慧芬、任大熙、康乐、李柏亨、毛汉光提供给我或帮助我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德本弘子(Toku-

moto Hiroko)协助我做了一些日语发音方面的工作;陈小玲在电脑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要向他们所有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研究大部分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我同样要感谢那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耶鲁大学的斯特灵纪念图书馆、东京大学的文学部图书馆,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总图书馆和亚洲图书馆。我还要感谢为我提供资助、使我的研究和写作得以完成的这些组织,它们是(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基尔斯·惠廷夫人基金会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此外,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赫伯特·吉尔伯托、弗兰克·史密斯、弗吉尼亚·沃尔什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友好、及时的协助。

在我的第一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也想感谢在我的生命中,一直给我以帮助的人。首先是我的父母,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就影响了我,我的学术追求也得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和持久的支持。我的弟弟和妹妹对我的关切也一直都是我重要的力量源泉。在我读研究生和作为新进学者的那些年里,我的岳父岳母和我的内兄周弘宪也一直支持着我。还有我的房东沃尔特·斯普鲁盖特夫妇,我也不能忘记,从1982年到1987年在美期间,他们给我和我的妻子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安定的家。对于所有这些人,我要满怀爱意地说声谢谢。

最后,把我全心全意的感激献给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朋友周婉窈,感谢她给予我的帮助、建议和理解。

年 表

西汉	公元前 202—公元 8
东汉	公元 25—220
三国时期	220—280
西晋	265—316
分裂时期	
北方： 十六国	301—439
北魏	386—534
东魏	534—550
西魏	535—556
北齐	550—577
北周	557—581
南方： 东晋	317—420
[刘]宋	420—479
南齐	479—502
梁	502—557
陈	557—589
隋	581—618
唐	618—907
唐高祖	618—626
唐太宗	627—649
唐高宗	650—683
武则天	684—690
[武]周 武则天	690—705

唐中宗	705—709
唐睿宗	710—712
唐玄宗	712—756
唐肃宗	756—761
唐代宗	762—779
唐德宗	780—805
唐顺宗	805
唐宪宗	806—820
五代	907—960
北宋	960—1127
南宋	1127—1279

缩 略 语

CTS	旧唐书
CTW	全唐文
CYKWC	陈寅恪文集
CYLY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HCLC	韩昌黎集
HTS	新唐书
LYYC	柳宗元集
LYHC	刘禹锡集
Taishō	大正新修大藏经
TCTC	资治通鉴
TFYK	册府元龟
THY	唐会要
TKSC	杜工部诗集
TLHW	唐吕和叔文集
TTCC	唐大诏令集
YTC	元次山集

前言

在中国,对儒学经典的研究和对其教义的阐述是一个未曾间断过的传统;因此,中国并没有发生十四到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复兴那种意义上的儒学“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思想活力。在古代中国,儒学在思想层面上最长、最重大的衰落时期,是从大约三世纪到十世纪,也就是从汉帝国分裂到宋朝开始的这个时期。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先后在中国占据着支配地位。不过,这种局面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伴随着一种新的传统的出现得到了改变,这种新传统通常被称为“新儒学”。宋朝(960—1279)的新儒学运动不只是标志着儒学的强势复兴,这场运动也把儒学确立为了中国的主流思想,直到二十世纪早期五四运动的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实际上,新儒学是中国几个重要的思想进展之一。本书讨论了唐(618—907)中期的一段思想发展史^①,这场思想发展和新儒学的缘起有着重要的关系。

但是,“新儒学”是一个模糊而有争议的术语;因此,需要对本书中所使用的新儒学一词加以澄清。对这个问题通常的看法有三

① 这是新儒学最早确立、使用最广泛的含义。对这一用法的新实例,参见丹尼尔·K. 加德纳《宋代的思考方式和话语方式:对语录文的一些思考》,《亚洲研究》50:3(1991年8月),574—603,特别是574页n. 1。在中国,“道学”传统比“理学”要更为著名。但是这一术语直到十三世纪中期,道学形成很久之后才出现,而且和一个特定哲学学派(程颐—朱熹学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参见狄百瑞《引言》,狄百瑞等编《韩国新儒家的兴起》(纽约,1985),14—15页;田浩,《儒学研究的新方向:区别新儒学和道学之不同的途径》,《东西方哲学》,42:4(即将出版,1992年10月)。

种。第一种看法将新儒学等同于所谓的道学,也就是宋元明时期关于形而上学、人性论和对道德修养的阐释方面的儒学思想流派。这一观点背后有一流行的假说,即道学是中国宋明时期最具原创性、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潮流。第二种观点要广义一些,认为新儒学包含了宋代和其后的帝王时代所有的道学有这样那样联系的儒学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儒学可以说是包括了从宋代到清末整个的儒学传统。^①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儒学是一个太过模糊的概念,几乎无法用来做历史的描述,而应该用别的术语取代它,尤其是历史上确曾用过的那些术语。^②

在本书中,“新儒学”是泛指,其指称和界定的是从北宋中期直到封建帝国晚期的儒学传统。换句话说,这种用法与上述第二种看法意义相近。我所以持这一观点,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最近发表的很多质疑“新儒学”这个术语的批评是有依据的。然而,尽管“新儒学”这个词面临着种种难题,但它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至少在一种意义上是有价值的:它可以用来表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即封建帝国的晚期,在这个时期,儒学成为主流的哲学思想;而且,这个术语也折射出来,这种哲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和之前的儒学传统有着深刻的不同。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这样定义的话,“新儒学”这个标题就太含混了,似乎包含了中国

① 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是狄百瑞。参见他的《重估新儒学》,参见芮沃寿编写的《中国思想研究》(芝加哥,1953),81—111页;《引言》,狄百瑞等编《韩国新儒家的兴起》,4—17页。强调清代学术、思想和宋明儒家哲学之间继承性的观点,参见余英时,《清代儒家知识分子崛起的初步研究》,《清华学报》,新版,11: 1 and 2(1975年12月),120—129页。

② 田浩在他的《儒学研究的新方向:区别新儒学和道学之不同的途径》中对此做了激辩。这篇文章和狄百瑞的《引言》中也包含一些关于“新儒学”这个术语不同用法的讨论。和田浩相似的观点,参见彼得·鲍尔《“我们的这种文化”:中国唐宋时期的思想变迁》(斯坦福,加州,1992),第1章第4部分。

封建帝国晚期所有视自己为“儒士”的人。^①但是，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有时无法避免使用一个术语来概括一个极其复杂的、相当长的时期。“启蒙运动”也是一个既有的指称，但很明显，它并不意味着十八世纪法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哲人。

第二，我认为，用“新儒学”这个词来标示唐代以后的儒学传统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道学仅仅是宋朝诸多儒学思潮中的一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观念、新思想对其他儒家知识活动、儒家教育、儒家流行文化的巨大影响与日俱增。此外，我还看到新儒学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以前没有过的：它与一套新的问题相关并且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传统儒学不曾注意到的。道学只是这股巨大潮流中最显著的一支。第三，我想强调一下，本书只是讨论唐宋思想转型的特点和新儒学传统的缘起，并不直接涉及宋朝及之后的中国学术思想。因此，上述三点既不是想要试图解决有关“新儒学”这一术语的争论，也不是要表达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确切看法。我把新儒学定义为宋朝及之后的儒学传统，只是为了在我的论述中使其成为一个可用的概念。另外，在我的研究中，有时也把道学称为“新儒家哲学”或者“新儒家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

宋朝的新儒学并不是一场突然爆发的革命；它是从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思想转型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儒学传统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纪中期，恰好就是唐代的中期。这一时期，有一股探究原创儒家精神以及儒教原则指导意义的兴趣，在数个知识活动领域蔓延开来。大家同样普遍认同的另一点是，儒学这次全新的复兴是一个持续切实的思想传统，其关键的发展时期是在公元九世纪的前十五年。这个时期，几乎整整一代的主要文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以不同的方式在努力推进

① 这一点参见田浩，《儒学研究的新方向：区别新儒学和道学之不同的途径》。

儒家理想；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战士莫过于韩愈（768—824）。本书将讨论这个在唐宋思想转型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阶段；明确地说，本书要讨论的是柳宗元（在 773—819 年间）的思想、情感以及它们和中唐时期儒学复兴的联系。在解释本书试图完成的工作和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对我们目前的中唐时期儒学复兴的知识作一简要的评论。

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充分分析过关于中唐时期儒学复兴的三个主要课题。第一个课题是八世纪中期由一批散文家掀起的早期的古文运动。第二个是对经学研究的一种创新性的和阐释性的形式，它和早期古文运动同时期发生，但没有什么关联；这一课题是由啖助（724—770）和赵匡（约 770—780）这两个当时还隐没无名的经学家提出来的。^① 这两场运动之所以在学术史上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它们真正开创了中唐时期儒学的复兴，而且针对它们的研究，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了儒学复兴初创阶段的图景。

另一个被学界关注的问题是韩愈的思想，还有关注程度小一些的李翱（774—836）的思想。在文学上，李翱是韩愈的追随者，他和韩愈的思想也极为相似。^②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韩愈是中唐儒教复兴鼎盛时期无可争辩的领袖人物。

① 考虑到这两场运动在本书之后的章节中将有详细的讨论，在此我仅列出基本的参考书目信息。对早期古文运动的一些深入讨论，参照彼得·鲍尔《“我们的这种文化”：中国唐宋时期的思想变迁》，第 4 章；钱基博《韩愈志》（上海，1957），第 1 章；林田慎之助《唐代古文运动的形成过程》，《日本中国学会报》，29（1977 年 10 月），106—123 页；麦大维《八世纪中期的历史理论和文学理论》，收录在崔瑞德和芮沃寿编写的《唐代概观》（纽黑文，康涅狄格，1973），331—341 页。对啖助和赵匡学术的研究大部分在日本和中国。大致的观点，参见麦大维《唐代的国家和学术》（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101—103 页。

② 对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韩愈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是查尔斯·哈特曼的《韩愈与唐代对和谐的探寻》（普林斯顿，新泽西，1986 年）。对李翱思想的全面研究，参见蒂莫西·休·巴雷特，《李翱思想中的佛教、道教和儒学》（博士学位论文，耶鲁大学，1978 年）。

但是,即便更注目于唐宋儒学的发展,他仍是富于远见卓识的。他不只有力地捍卫和支持了儒学的价值,同时从基础上质疑了佛教和道教的世界观——后来证实,儒家学者致力于熔铸一种全新的、可以对抗佛教和道教的形而上学及精神观念,其主要的驱动因素正源于此。在这个方面,李翱是唐代最具创造性、成就最大的一位思想家。

尽管现代的学术研究成就巨大,但我们仍对中唐儒学复兴缺乏系统、可靠的认识。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我们当下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最主要的欠缺之处在于,它是不均衡的。对于一小部分事情,我们了解得非常多,而对于其余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了解的这部分情况并不足以告诉我们那些基本的事实。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直到九世纪早期,中唐的儒学复兴才发展成为一场重要而独立的思想运动,所以,对起始阶段的古文运动以及啖助和赵匡学术成果的研究能够提供新儒学的起源的观点就颇显其局限性。此外,正像本书中将要揭示的那样,尽管韩愈和李翱在九世纪早期的儒学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他们的思想却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的儒学精神。换句话说,虽然韩愈和李翱的思想观念最明白无误地预示了后来的宋代儒家哲学,但他们的这些思想观念远不能向我们揭示出中唐儒学复兴的全部典型特征。

在韩愈和李翱的时代,有另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儒学知识分子柳宗元,我的这个研究就代表了一种努力——试图通过对柳宗元的研究,探索中唐儒学复兴的特征。实际上,柳宗元和韩愈在东亚被认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主要的倡导者。^① 柳宗元的生活在

① 文学学者对柳宗元的研究不计其数,宗教和哲学学者的研究则要少一些。但是,几乎没有主要研究从思想史和新儒学起源的角度入手。关于柳宗元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参考书目,参见倪豪士,《柳宗元研究资料选编》,《书目季刊》,21: 1(1986年6月),205—243页。

很多方面都和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转型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我计划仔细检视这些方面。包括他的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他的生活和政治生涯,尤其是他曾参与一场失败的政治改革中去,他对于儒学哲理的看法,他和古文运动以及新的学术正统的关系,他的社会评论和政治评论,他关于人类生活个人领域的细致入微的感触和深思等等。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本思想自传。我的首要目的,是力图通过对柳宗元的生活和思想的审视,对中唐儒学复兴做出更多的、令人鼓舞的新的揭示。所有的问题都将从它们和儒学复兴的性质及演化之间的关系或牵连这个角度来加以讨论;那些与这个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東西,比如柳宗元的诗和散文,提到它们时将只是作为背景出现。

我选择柳宗元作为我的研究的焦点有三个原因。第一,既然我们对中唐儒学复兴的认识并不均衡,那么,对这场运动在鼎盛时期的另一位主要领导者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提升既有认识应该是有帮助的。第二,柳宗元的兴趣与思虑几乎覆盖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新儒学复兴运动的所有方面。因此,柳宗元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从这一个案,人们可以获得对更为广泛的现象的看法。如果“一粒沙里见世界”可能的話,那么柳宗元就是一粒值得探究的沙子。

第三,作为一个儒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从政治哲学方面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他的观念和韩愈及李翱关于儒学的观念有相当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本书想要论证柳宗元的儒学理想在他们那个时代比韩愈和李翱的更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至少在中唐时期,作为儒学运动的来源,对重振并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渴盼,远比构建儒家道德和形而上学哲学以比肩佛教和道教说教的努力重要得多。柳宗元的思想框架主要依据传统而建,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儒家思想只是约束人类的社会和行为的方方面面,而人类内心的精神生活却是佛教和道教的领地。这也就意味着中唐时期的佛学复兴实际上并不是一场新儒学的运动;更

大程度上它主要是过时的旧儒教的复兴,然而,一种新型的儒学从中萌发了出来。我相信,对柳宗元的这一专题研究能够很好地阐明中唐儒学复兴的这一基本特征,因此能够增进我们对新儒学起源的认识。

最后,我想指出,我无意把柳宗元仅仅简化为一场思想运动的某个组成部分。只要可能,我都想随时告诉大家:柳宗元并不只是为一场思想运动而生;事实上,更多的时候他对真实的社会处境和个人处境的回应,倒是为新生的思想传统注入了生命。

目 录

致谢	1
年表	1
缩略语	1
前言	1
1. 初唐、中唐时期的文人及其思想	1
2. 柳宗元与长安的氛围	28
3. 公元 805 年：失败的改革	64
4. 法则的宣言：“道”与古	81
5. 天、超自然与“道”	100
6. 文学理论、经学研究及其他	129
7. 柳宗元儒家思想的来源	152
8. 个人领域	167
结语	193
译后记	199
词汇表	202
参考书目	209
索引	236

1

初唐、中唐时期的文人及其思想

柳宗元出生在唐代宗大历年间的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历的 773 年。这一年本身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柳宗元出生前后的这个时代，却见证了唐代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和重大的动荡。促成这些巨大变化的催化剂是爆发于 755 年结束于 763 年的安史之乱。这次叛乱之后，唐王朝陷入了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在发生叛乱的东北地区，^①支持和追随安禄山的军事、政治力量继续着他们的统治。另一方面，朝廷在艰难地扑灭叛乱的过程中，其他地区的很多军阀领袖获取了权力，开始维护自己的半独立特权。这两个因素一起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并且导致了唐王朝不断的武装叛乱或是武装叛乱的威胁。^② 在社会层面上，这次叛乱给威名素著的山东贵族集团以沉重打击，他们的主要基地——洛

① 东北地区(唐代时期称为河北)在文化上也自此开始与主流中国社会疏远。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文集》(上海,1980—1982)第5卷,25—28页;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伦敦,1955),75—81页。

② 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军阀割据的一个综览,参见C. A. 皮特森,《中晚唐的朝廷与藩镇》,收入崔瑞德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1部分,《隋唐时期的中国》,589—906(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464—560页;蒲立本,《安禄山叛乱和晚唐长期军事战乱的根源》,收入约翰·克提斯·派里和巴德维尔·C. 史密斯合编的《唐代社会论文集》(雷登,1976),49—59页。地方割据势力挑战了唐王朝的政权,也促成了宦官在朝廷中的得宠,因为皇帝对常备军事力量和官僚机构越发不信任了。